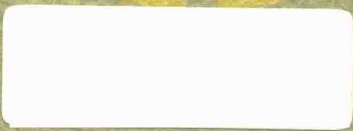


叙舊

叙旧文丛

炉边絮语话文坛



陈漱渝
著

叙舊——
叙旧文丛

炉边絮语话文坛

陈漱渝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炉边絮语话文坛 / 陈漱渝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1

(叙旧文丛)

ISBN 978-7-5334-6956-6

I. ①炉… II. ①陈…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中国
—现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4703 号

叙旧文丛

LUBIAN XUYU HUA WENTAN

炉边絮语话文坛

陈漱渝 著

责任编辑: 黄珊珊

特约编辑: 林志鸿

美术编辑: 季凯闻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2629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17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956-6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叙旧文丛”出版弁言

叙，讲述，盼侧耳倾听；旧，过去，期一日相逢；叙旧，网罗旧闻，纪言叙之，以温故，以溯往，以述怀，以知新。

搜寻、稽索、钩沉、抉隐，一句话，一件事，一本书，一个人，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在琐细字间，鲜活，绽放。

走进旧时光，来一场返程之旅，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我们相信，叙旧的过程，是唤醒记忆，省思历史，亦是安顿今者，启示未来。

目 录

- 1 .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
- 32 . 鲁迅的抬棺人黎烈文——以《中流》半月刊为中心
- 43 . 并不神秘的许羡苏
- 49 .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鲁迅与郁达夫
- 68 . 朱毅农：为胡适发疯至死的女子
- 88 . 汪静之：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 105 . 读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 119 . 我接触的第一本新文学读物：《关于女人》
- 138 . 寻找高长虹
- 151 . 石评梅：她在悲剧中体验人生
- 177 . 文中有画的凌叔华
- 185 . 朱自清去世前后
- 195 . 雨打芭蕉——台北温城街访台静农
- 202 . 春风化雨忆恩师——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 110 周年
- 219 . 学术有规范 文章无模式（后记）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许寿裳

鲁迅一生助人甚多，特别是帮助弱势群体和文学青年。他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又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为人力车夫包扎伤口的故事，为女佣王阿花赎身的故事，以及甘为文学青年当梯子、当垫脚石的许多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

然而鲁迅一生也得到了一些中外友人的帮助，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先生。虽然许先生十分崇仰鲁迅，视鲁迅为相交35年的畏友，也被鲁迅研

究的通人冯雪峰称为“终生忠实于鲁迅的一位朋友”（见冯雪峰遗稿《鲁迅传》），但有一点却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他同时也帮助鲁迅改变了命运。

东京结缘：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奏

许寿裳先生 1883 年（清光绪九年癸未）2 月 4 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水澄巷，是鲁迅的同乡，比鲁迅小两岁。他们都轻功名，不重视科举考试。1902 年初秋，许先生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东京留学，初入弘文学院浙江班补习日语；其时鲁迅已早半年入校，编入江南班。这两个班级的寝室和自修室相毗邻，为两人提供了接触之机，他们很快订交，终成莫逆。1904 年，21 岁的许先生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读预科，后入史地科；鲁迅则于 1904 年 9 月考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虽然学业各有专攻，但他们始终是革命营垒的战友，文学事业的同志。

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对文学已产生浓厚的兴趣，买了不少日译世界名著，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罗马神话，还有一部日本印行的《离骚》线装本——鲁迅赴仙台前送给了许寿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

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解决这三个问题，成为了鲁迅后来从事文艺运动的宗旨。1907年夏天，在留日学生普遍鄙弃文艺、重视实用学科的“冷淡的空气”中，刚从仙台医专退学的鲁迅集合几个志同道合者，准备筹办一份名为《新生》的文艺杂志。鲁迅说，“新生”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呐喊·自序》）；许寿裳说，“《新生》之名，取于但丁作品，亦不为人所知”（1944年2月4日致林辰信），但也许这两种含义兼而有之。由于原来几位答应为刊物出资和供稿者爽约，杂志遂告流产。坚持到最后的三个人中，除开周氏兄弟之外，仅有许寿裳一人。

鲁迅和许寿裳文学上的合作还表现在替《浙江潮》撰稿。《浙江潮》是一份综合性月刊，1903年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主编，第五期起由许寿裳接编。应许寿裳之约，鲁迅先后在该刊发表《说钿》《中国地质略论》《哀尘》《地底旅行》等译文和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这些译作均为鲁迅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字。《哀尘》是法国作家雨果《随见录》中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雨果又将这个情节写入了他的史诗性巨著《悲惨世界》。翻译《哀尘》，显示出鲁迅非凡的艺术鉴赏力和战斗的现实主义倾向。《地底旅行》

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鲁迅试图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方式在文盲充斥的中国普及科学知识。《说钼》介绍了居里夫人发现镭射线的经过，表明鲁迅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有及时的了解，并且已经开始运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考察问题。《中国地质略论》既是科学论文，又是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警世之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在中国地质资源惨遭列强豆剖瓜分的岁月，这些力敌千钧的文句奏响了救亡卫国的时代最强音。《斯巴达之魂》写的是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悲壮故事，通篇张扬着一种反抗强权暴行的尚武精神。在1903年4月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乃至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文中歌颂的“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牺牲精神，都使读者热血沸腾，斗志昂扬。文中烈女涑烈娜的形象，正如许寿裳所说，“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许寿裳通过媒体首次把鲁迅推上了文化舞台，而首次公开亮相的鲁迅也表现出了他在人文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丰厚潜质，预示了这位文化巨人在未来岁月中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1907年12月，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河南》

杂志，侧重于反清革命和科学启蒙宣传。鲁迅在该刊发表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言论文，表述了他早期启蒙主义的政治观、哲学观、文化观，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指出，这些论文“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为了跟鲁迅遥相配合，许寿裳也以“旒其”为笔名，在《河南》杂志1908年第4期、第7期连载了长篇论文《兴国精神之史曜》（未完稿），指出：一个国家要想振兴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国民如不自觉，则国为国，民为民，二者不发生任何关联，所谓国民实际上只是傀儡。他以法国大革命、德国宗教改革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历史经验为借鉴，说明只有张扬个性，尊重自我，才能使国民的内在精神光耀千秋，“如星日之丽天，如江河之行地”，创造出“经纬寰宇”的伟业。论文题目中的“曜”即光耀，是想用历史之光燃起人民内心的精神之光（“以史曜现吾民之内曜”）。有研究者将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与许寿裳的《兴国精神之史曜》视为姊妹篇，这是很有见地的。

留日时期，除开文学志向相近，共同的革命志向更

是维系许寿裳跟鲁迅友谊的一条强韧纽带。据许寿裳在《鲁迅年谱》中介绍，鲁迅于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而章太炎正是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此事为鲁迅二弟、同为章门弟子的周作人所否认，说鲁迅既未加入同盟会，也未加入光复会，什么缘故他也不知道。两说分歧，令读者莫衷一是。但鲁迅也曾对胡风说过：“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群众》第8卷18期）日本汉学家增田涉撰写《鲁迅传》时，也提及鲁迅曾加入光复会，鲁迅审阅原稿时予以保留，表示默认。后来，增田涉在回忆录《鲁迅的印象》中专门写了一节，题为《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既肯定鲁迅入会这一史实，又指出鲁迅跟光复会领导人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清末革命党人多主张暗杀，光复会尤甚。有一次上级命令鲁迅去暗杀某要人，他担心自己是长子，牺牲后母亲生活将遇到困难。上级认为鲁迅行动之前就顾虑身后事不妥，便取消了派给他的暗杀任务。这些回忆都是对许寿裳说法的有力支持。1944年5月26日，许寿裳在致鲁迅研究家林辰的信中再次强调：“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

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出于不知道，因为人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许寿裳同一信中还说，鲁迅是光复会会员，许广平知道得很清楚。

许寿裳不仅是鲁迅加入革命团体的见证人，而且可以说是鼓动者和介绍人。据鲁迅友人沈颀民回忆，光复会的前身是以原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为骨干组成的“浙学会”。许寿裳 1899 年至 1901 年在求是书院就读，深受恩师宋平子先生影响——这位相貌古朴、体格魁硕的老师讲课时虽不肯明斥清廷，但力举专制政体下民生的疾苦，国势的陵夷，“虽不昌言革命，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一日缓也”（许寿裳《〈宋平子先生评传〉序》）。所以，留日时期许寿裳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热情有时高于鲁迅。比如，许寿裳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不绝，而鲁迅就没有参加此类活动。加入光复会也是许寿裳在前，鲁迅在后。正是在这种反帝救亡运动汹涌澎湃的历史背景下，许寿裳和沈颀民力邀鲁迅参加浙学会。鲁迅“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定”（沈颀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1961 年 9 月 23 日《文汇报》）。

两次力荐鲁迅：从小城教员到京城公务员

1909年4月，原拟赴德国留学的许寿裳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兼地理学、心理学教员，并协助新任监督沈钧儒（衡山）招生延师，筹备开学。许寿裳放弃留学德国的原因是因为清政府的留欧学生监督蒯礼卿先生辞职，因此无法获得公费贴补，不能成行。其实，跟许寿裳一样，鲁迅也曾有赴德留学的想法。1906年6月，他曾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准备在仙台医专所学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德文，并据德文译文翻译过俄国作家安特来夫的小说《漫》和《默》。这些译文发表前均经许寿裳审定，印象是“字字忠实，丝毫不苟”。

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鲁迅二弟周作人与日本羽太信子在东京登记结婚。羽太信子家境贫寒，做过旅店的“下女”和低级酒馆的“酌妇”。周作人结婚之后，作为长兄的鲁迅经济负担顿时加重；跟许寿裳遇到同一情况，他留学德国的计划也不能实现。于是，归国谋职就成为了当时鲁迅最重要的人生需求。鲁迅向许寿裳求助时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按：起孟是周作人的自号，又作岂孟）

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职，庶几有所资助。”由于许寿裳向新任监督沈钧儒力荐，鲁迅于1909年9月赴杭州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鲁迅后来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曾“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由此可见，许寿裳是帮助鲁迅归国之后解决“生计问题”的关键人物，而解决“生计问题”是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的必要前提。对于经济问题，鲁迅说得很直白：“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取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又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议论吧。”鲁迅进一步总结道：“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为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坟·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的时间极短，原因是他跟许寿裳共同参加了反对新任学堂监督夏震武的“木

瓜之役”。这位新监督之所以被讥为“木瓜”，是因为他一贯以道学家自居，不仅反对革命，说什么“革命哗于野”，而且还反对立宪，说什么“立宪哄于廷”。此后，鲁迅返回故乡，出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学监（相当于教务长），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鲁迅对当时的工作环境极度不满。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他“收入甚微，不足自养”，靠卖地之款补充日常用度；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职时，绍兴军政分府拨给学校的全部经费仅 200 元，生活同样拮据。学校人际关系又十分紧张，鱼龙曼衍，风潮迭起，“防守攻战，心力颇瘁”。在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坦陈了他内心的郁闷，甚至希望有一场洪水冲尽绍兴的污浊：“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1911 年 1 月 2 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强烈希望许寿裳帮助他离开绍兴，“虽远无害”（1911 年 7 月 31 日致许寿裳信）。

辛亥革命之后，时代向鲁迅发出了召唤，但又是许寿裳为鲁迅提供了重要机遇。1912 年 2 月中旬，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同年 5 月，教育部迁入北京，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员、科长，后又升为佥事，位居科长之上，司长之下。许寿裳

是教育部参事，职位高于鲁迅。鲁迅能到教育部任职，完全由于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鼎力推荐。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就提到这件事，说“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此后，尽管教育总长的人选如走马灯上的人物一样不断更换，但鲁迅的位置却一直牢固；虽然1925年8月13日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一度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之职，但经鲁迅向平政院控告，翌年初以章士钊的失败和鲁迅的复职而告终。

鲁迅走出闭塞的水乡绍兴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北京，由一个中学堂的教员、行政人员而成为国家公务员，这在鲁迅生命史上的意义长期被低估。鲁迅当时对绍兴的不满除了前文所说的经济困窘和人事纠葛之外，还有一个人文环境问题，而这种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1911年7月31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得很明白：“闭居越中，与新颖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此处的“颖”通“昊”，指的就是一种新鲜开阔的气息。如果僻居小城，不能把握时代脉搏，就必将影响对宏观问题、全局问题的思考和判断，而使自己变成一个目光短浅的村夫。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在当时的教育部只是一个小吏，至多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所谓处级“中层干

部”，但论其管辖范围却不禁令人咋舌。据《教育部官制案》规定，鲁迅任职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不仅负责博物馆、图书馆事项，而且还负责筹备出国展览、通俗教育、演剧、美术、动植物园等事项，其管辖范围类似于当今的文化部。鲁迅因而成为了当今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在提倡美育、兴建公园、考察新剧乃至参与审定国徽、国歌等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机遇不给没有充分准备的人，但有准备而无机遇，也只能落得个郁郁不得志的结局。总之，大约14年的教育部公务员生涯，不仅为鲁迅提供了不少于3万余元的俸银，而且使他原有工作的局部性质扩展而为全局性质，他的业绩也因之产生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影响，这不能不特别感谢许寿裳。

在教育部供职期间，许寿裳一度跟鲁迅朝夕共处，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夜话，给予鲁迅多方面的切实帮助。如今收入《鲁迅辑校古籍》一书的《沈下贤文集》，就是许寿裳协助鲁迅校勘的。许寿裳本人对此事却缄口不言。沈下贤（781—832），名亚之，吴兴人，中唐文学家，擅诗文，著有《沈下贤文集》共12卷，其中诗赋1卷，文11卷，但流传到宋代时已“字多舛脱，不可卒读”。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期间，